

「戰爭與和平專題研究：安全與戰略」期末報告

指導教授：羅致政老師

學生姓名：沈哲煥

系級組別：政碩二國關組

學號：89314007

假想敵因素對(台海兩岸和美國間)戰略設計與執行之影響

第一章 導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家如何認定敵人？誰是才是真正的敵人？為什麼？這應該是比戰略、戰術等更須優先界定的根本問題，也是論證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定調執行前應先通盤考量，而非想當然爾。任何環節的決策失當都比不上起點時方向的錯誤。

二 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

- 1、“假想敵”的概念、緣由、必要性
- 2、“假想敵”的認定、範圍、主次之別
- 3、其與真正的威脅來源是否必然相符？ 心理 or 實質？能力 or 意圖？區域、對象 or 能力？
- 4、能否達成預期目標、扼制衝突？其代價、風險如何？有無可能反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 5、歷史上的操作 正、負面個案
- 6、台海兩岸和美國之三邊關係中假想敵因素之演進、性質與強度
- 7、國際、區域環境與短、中、長程時間之考量
- 8、敵友之辨與因應措施 對抗？合作？or 其他選項？

三 文獻檢閱

目前針對“假想敵”這個概念做深入探討的書籍、篇章尚屬有限。

四 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以文獻、歷史個案之研究、內容分析等方式為主。

第二章 “假想敵”釋義

兩項前提：承認威脅的存在、方向；戰爭並非經常發生。

第一節 “假想敵” 的概念、緣由、必要性

“假想敵” 一詞的英文為 “imaginary enemy”，意指一國在非戰時期所認定的可能、潛在敵國。而其緣由可能基於地緣 如：泰國、緬甸、種族宗教 埃及、以色列、意識形態 美國、古巴 or 其他更根本性的歧見矛盾。

誠如孟子所說的“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假想敵” 的存在可激勵一國進行必要的經濟、軍事等領域的有效運作與發展，因而可以是一種有益的動力來源。基於這樣的邏輯，也有人說“最強的敵人才是最好的朋友”。當然，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往往是更殘酷的生死存亡。

第二節 “假想敵” 的認定、範圍、主次之別

—

“假想敵” 的客體對象究應為國家、政府 權、軍隊 如：國軍 vs. 解放軍、人民 or 文明 civilization？各國的戰略理論與設計上常未對此做區隔，從而造成落實上的困擾、甚或招來批評，如：即有人質疑，美國對伊拉克的禁運措施是傷害了總統海珊 or 只不過懲罰了無辜的伊國人民？美國的“恆久自由”（Enduring Freedom）行動究竟是在打擊 Taliban 塔利班政府 權 or 是阿富汗及其人民？

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 1993、1997 年提出、闡釋其“文明衝突論”，他建議的對策包括：應防範東亞儒家文明與伊斯蘭等兩大文明聯合對抗西方文明、抑制儒家與伊斯蘭國家的軍事擴張、製造儒家與伊斯蘭國家間的差異與衝突、鞏固能反映西方利益與價值並使之合法化的組織¹

但其所舉文明俱非新生，何以其差異會使爾後的衝突深化、擴大？為何是儒家與伊斯蘭國家聯合？為何是對抗西方文明？而非他種排列組合？

$$C_2^8 = 8!/2!(8-2)! = 28 ; C_1^6 = 6!/(6-1)! = 6 ; 28 \times 6 = 168$$

為何儒家與伊斯蘭國家能大致和平共存而未發生文明的衝突？這是否表示導致衝突的關鍵是“個別文明中的某些成分”？而非“文明”這個大概念？是否為了某種動機而故意創造這種假設？以提供某種政治、社會需求的理論基礎？

二次大戰前的美國與伊斯蘭 阿拉伯世界並無任何重大衝突；而同屬西方陣營的加拿大或義大利與葉門或沙烏地阿拉伯等國亦無本質性的衝突或誘因，這是否表示國家的“國際角色與企圖”和“地緣因素”才是問題之核心？

¹ Samuel P.Huntington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7。

為此，杭廷頓這種由“基督教文明中心論”的觀點預告“假想敵”的方式是否過於露骨的表現出其“惟恐天下不亂”的企圖？以“文明”做為界定敵我的區隔基準，範圍是否太廣、太浮濫？

二

國家間是友好或對立的印象將影響彼此判斷對造言行係善意或惡意之方向與強度，從而常導致誤判與盲動。例如：與其說中共之介入韓戰是顯現其侵略性；不如說是對美國主導的聯合國部隊侵擾鴨綠江邊境所帶來不安全感的反應。²

又，一國可能同時有數個假想敵，如：印度、日本、以色列等。因此，基於資源的配置、戰略設計上的便利、與“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邏輯，一國仍有可能與次要的假想敵合作³，以平衡主要假想敵的威脅⁴，如：美國在1970~90年代之轉向、聯中共以制蘇共。

1949年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並未隨國民政府將使館南遷至廣州；與此同時，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學校長時的學生黃華，也被中共任命為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負責接收外交部、並向原駐華使節宣達建交原則。這樣的安排並非偶然，而是美國和中共新政權彼此有意接觸、建立溝通管道的事證之一。但因雙方內部的強硬派反對、以及1950年韓戰爆發，使得兩國關係難以逆轉的惡化。

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欲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握手遭拒；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 Richard M. Nixon 首度穿越竹幕、赴中國大陸訪問時，特意通知隨行人員在他和周恩來握手前暫緩下機，下機後他主動伸出手來向周恩來走去，同周恩來熱情的握手。離開機場時，周恩來寓意深長地對尼克森說：“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

在尼克森抵達北京當天，北京的《參考消息》報上特別刊登了一條列寧語錄，大意是“同強盜握手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消滅強盜。”這句不無哲理的話自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但，撇開所謂的政治立場，這難道不是國際關係中最動人的一幕？

第三章 “假想敵” 概念之運用

第一節 其與真正的威脅來源是否必然相符？

² 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 Spiral Model, and Intentions of the Adversary,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3, 1976.

³ 認知心理學中的“結構平衡理論” Structural Balance Theory 運用於人/國際關係中，即如—阿拉伯諺語所示：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我的敵人，敵人的朋友是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我的朋友。羅致政，台灣安全多邊化戰略，〈問題與研究〉，1996.9.

⁴ “威脅”平衡論較“權力”平衡論適當。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h.1, 1987.

對手的要件為何？敵人的本質為何？認定假想敵或 potential adversary 的標準是基於自身的心理認知 or 對手的實質能力？capability 能力 or intention 意圖？區域 對象 or 能力？

筆者認為純以“區域、對象”來界定假想敵，因目標集中，很容易使彼此的敵意螺旋式地升高，也可能產生盲點、掛一漏萬；但，忽略意圖，純以“能力”來界定，又可能一竿子打翻整條船，一套標準得罪所有軍事實力較強、足以對本國構成威脅的國家。

發生 911 受襲事件後，美國國防部在其於 2001 年 9 月 30 日公佈的“四年國防檢討報告”中即強調美國的新戰略信條 Strategic tenets 與國防戰略 Defense strategy “is built around the concept of shifting to a Capabilities-Based Approach to defense”、“one that focuses more on how an adversary might fight than who the adversary might be and where a war might occur”，俾 “broadens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⁵

筆者認為這樣的修正 how 較過往 who or where 切合實際，因為它不但強調了“能力”，也隱含了“意圖”的概念。因為一個全然沒有敵意的國家 or 政府、軍方領袖應該是談不上要“如何打擊”美國的。

第二節 能否達成預期目標、扼制衝突？其代價、風險如何？有無可能反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老子》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怨”。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當甲物體對乙物體施力時，乙物體就會同時以一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之力施予甲物體，故此定律被稱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兩力同時存在。

各國在制定政策時，不免需要一些參考座標，但若為合理化政策及鞏固利益而公然劃分敵我，這種不智和不健康的心態很可能造成反效果、後遺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此而來的片面作為只會喚醒、增強對方的敵意！卻無法保證在對抗中必然獲勝！

筆者認為敵人的“關鍵性”本質是敵意 意圖，而非能力。不斷地“虛擬、渲染敵人的存在”，或許常有內政考量、爭取預算、黨派之爭、利益團體遊說等因素的存在，卻很有可能使夢囈成為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實現的預言”！

第三節 歷史上的操作 正、負面個案

本文探討的是國際關係中敵友關係的轉變因素，但筆者想先舉個例子：

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錢學森於 1934 年考取庚款獎學金赴美，並先後於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深造，接受匈牙利猶太裔的氣體動力學宗師馮卡門 Theodore von Kármán

⁵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美國國防部，2001.9.30，pp.13~14。

指導，1939 年獲博士學位。1942 年通過安全考核參與美國軍方的火箭研究。

原已打算在美國落地生根的錢學森卻在共和黨籍的右翼參議員麥卡錫 McCarthy Joee 等掀起抓共產黨的白色恐怖中受到 FBI 和移民局長期的騷擾、侮辱。錢氏被懷疑對美國不忠，他的大批書信、文件被扣留，並遭媒體大肆渲染為機密檔案；後來經證實為無關機密的資料。但他已被剝奪參與相關科學研究的資格，最後甚至被軟禁。

在這樣的氛圍下，與中共原無干係的錢學森決定回到中國大陸。在 1955 年的中、美大使級“華沙談判”中，美國以錢學森交換韓戰期間被擄獲的美籍戰俘。錢學森返回大陸後在現代力學和火箭理論方面提供中共決定性的突破，並參與、領導科研團隊，促使中國在 40 年後擁有規模僅次於美、俄的核武裝備，且發展出洲際彈道飛彈，而被稱為“中國飛 導 彈之父”。

在麥卡錫恐怖時期，海軍副部長金貝爾 Dan Kimball 曾對朋友說，“錢學森知道太多對我們極有價值的事，他至少值五個師的軍力！”錢學森回國數年後，金貝爾再被詢及此事，他說：“這是這個國家所做過最愚笨的事之一。他比我還不可能是個共產黨員而我們竟然逼他走！”⁶

一 美國 vs. 古巴

古巴哈瓦那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執業律師卡斯楚 Fidel Ruz Castro 於 1959 年初率遊擊隊推翻貪污獨裁的巴蒂斯塔政權時，雖高舉共產主義大旗，卻無意與美國為敵，和蘇聯亦尚無多少聯繫。

但美國政府的言行 包括：政治宣傳、軍事入侵、經濟制裁；1997 年的 CIA 解密檔案承認曾計劃暗殺卡斯楚的行動多達 637 次...等 卻逼使卡斯楚完全倒向蘇聯。然而，當佔有古巴東南角關達納摩海軍基地的美國已歷經 10 位總統後，卡斯楚依舊在位。

如果歷史可以重來，美國是否會後悔當年的一念之差？與鄰國修好總不會錯吧？難道四十多年來都沒有化敵為友的機會嗎？得失之間究竟如何？

二 美國 vs. 俄羅斯

在 1991 年 2 月華沙公約組織解散、同年底蘇聯崩潰後，以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外長柯茲芮夫(Andrei Kozyrev)為首的俄羅斯政府對歐、美其實抱持相當友善、甚至順從的態度。但美國並未把握良機化解宿怨、俄國亦未獲得預期報償；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竟於美國的主導下不退反進，趁著莫斯科之政治、軍事與經濟皆處於相當退縮的情況下，將北約疆界儘量向東擴展，似欲防止俄羅斯有朝一日捲土重來，再度挑戰美國在國際社會之政治、軍事地位。

⁶ 張純如著，張定綺、許耀雲譯，《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台北，1996 年。

北約的東擴使俄羅斯有種夾雜著屈辱的不安全感，反而激發其政壇與民間對美、歐之不信任感！而美國及其盟邦在南斯拉夫的行動，其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戰略目標直指俄羅斯。

正因如此，俄羅斯一面倒向西方的對外政策路線開始轉向，1996年初，稚拙的柯茲芮夫被老成的普利馬可夫(Yevgeny Primakov)取代後，俄羅斯的對外政策與作為中開始展現其務實和強硬的一面。

毛澤東有首七律《人民解放軍領佔南京》，其中有一聯是這麼寫的：“宜將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在動盪的一國國內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無論分合，一個國家終究只會有一個政府。但是否適用在國際上呢？

當你面對一個渾身武藝、卻家道中落的乞丐，你可以選擇拉他一把 經援或接納 ，也可以不搭理他 任其自生自滅 ，但最好別出言譏諷、群起而攻地刺激他！美國的目標是讓俄羅斯永世不得翻身，但他躁進、粗魯的做法只會使自尊心受斷傷的俄羅斯人激發強烈的泛斯拉夫民族主義！

小布希政府就位後便不尋常地對俄羅斯展開大規模驅逐外交官的間諜戰，也引發俄國的反彈。小布希於2001年5月1日，宣佈部署NM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全國飛彈防禦系統；更於同年底宣佈廢棄與俄羅斯間的1972年反彈道飛彈條約 the ABM Treaty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 。

但，俄羅斯畢竟知道自己的實力，使得俄國只能先徐圖發展。再因美國圍堵中國的考量，加上出身KGB、手腕靈活的普丁 Vladimir Putin 繼任總統，又在911受襲事件中與美國高度合作，使美國對俄國的敵意降至冷戰以來的最低點。

三 美國 vs. 越南

1973年1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 Henry A. Kissinger 與北越政治局委員暨巴黎和談代表團特別顧問黎德壽 Le Duc Tho 正式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巴黎協定》。1975年，南越總統阮文紹 Nguyen Van Thieu 棄國避難，受託繼任的楊文明將軍於同年4月底在西貢市打開總統府大門，美國駐越使領館人員在陸戰隊護衛下全數撤出。

從此，美國展開長達20年的對越孤立。卡特總統時期的國務卿范錫 Cyrus R. Vance 雖曾建議應與越南關係正常化；但在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以“美中聯合抗蘇”的大考量為由，而使卡特作罷。

直至1994年，柯林頓(William Bill Clinton)政府解除對越貿易制裁；1995年，兩國建交；1997年，美國駐越大使彼得森 Douglas "Pete" Peterson 履新；2000年，柯林頓總統於參加汶萊 APEC 高峰會後首度赴統一的越南訪問。

美國政府官員終於能與當年率軍將其打敗的北越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赫赫有名的武元甲 Vu Nguyen Giap 將軍握手言歡！五、六十萬美軍部隊都辦不到的事，美元可以、和平可以！

四 新加坡 vs. 馬來西亞、印尼

新加坡在 1965 年獨立建國後，與馬來西亞、印尼間存有不少矛盾衝突，但李光耀總理在凝聚內部共識、穩定局面後便主動放低姿態，以實際的行動與東姑拉曼、蘇哈托等領導人交好，緩解對抗時期的僵局，化敵為友，也促進了東協的團結。

第四章 假想敵因素對台海兩岸和美國間戰略設計與執行之影響

第一節 台海兩岸和美國之三邊關係中假想敵因素之演進、性質與強度

一 台海兩岸間

1949 年底，在中國“國共內戰”中相互對立的兩造開始在台灣海峽兩岸的“台、澎、金、馬”與“中國大陸”各自建立起迄今五十餘年的有效統治。分立於兩岸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其相對應領土間的關係，其實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例如，台灣、澎湖、金門、馬祖、東沙島、太平島等地在歷史上的領有國都有或分隸、或重疊的多次變遷。例如：1662 年，佔有台灣的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才首度將台、澎置於同一支配者之下。⁷

兩岸間的僵局與衝突使台灣長期將大陸視為對手；中共亦以“反獨促統”為政略目標、而以“文攻武嚇、外交孤立”為手段。在台灣民主化進程展開和統獨爭議質變後，中華民國的國防報告書即以專章分析“中共軍事情勢”，亦可見我方仍以中共為假想敵。

二 美國與中國 大陸 間

一 二戰後美國的戰略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成為兩極體系中的霸權 hegemony；在冷戰結束後，美蘇兩極體系轉變，美國在政治與軍事方面取得單一超強的地位。因此，美國便欲鞏固其自認為於己最為有利的“單極體系”，並追求其所謂的“泛美和平 美國統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成為世界新秩序中的“霸主” hegemons。

⁷ 彭明敏、黃昭堂，《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1996 年。中國的元、明朝於 13 世紀下半葉在澎湖設治，隸屬福建省泉州同安縣；1661 年，鄭成功控有廈門、金門和台灣；1663 年，清廷收廈、金。1683 年，清廷將台、澎編入福建省；1885 年，設台灣省。1895 年，台灣割讓日本。同年 5 月 25 日，台灣民主國於日本占領澎湖後在台成立；10 月 19 日，日本滅之。

觀乎美國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JCS 之下編配了“太平洋、大西洋、歐洲、南方 中南美洲、中央 中東、太空、戰略、運輸、作戰”等九大司令部，即可知，當今世界，惟有美國有能力將其軍力投射至全球不同角落 暫不論其成效或成敗。

二 小布希政府之對外政策與亞太觀

由於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 2000 年總統選戰中的普選票輸給高爾(Albert Gore)近 54 萬票⁸，全國民意的正當性似有所欠缺；而且其德州州長的公職與國際經歷也是近幾任總統中最單薄的。因此，小布希不免有種要在國際事務上與柯林頓政府略做區隔的想法。

在外交方面，相較於小布希的被視為外交知識貧乏，柯林頓不但在喬治城大學取得國際事務方面的學位⁹，之後也以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並曾於著名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處擔任助理¹⁰。

在競選期間談及外交及國防政策理念時，小布希尚且屢屢使用“遠東” far east ¹¹ 這樣帶有濃厚“歐美中心主義”的字眼¹²，而非如今早已通用的“亞太”或“西太平洋地區”等詞彙，不免令人質疑他在 21 世紀將屆之際是否還有著冷戰時代前的舊思維。

或許正由於小布希自知對涉外事務陌生、且票源、財源來自保守派，便特別倚重前共和黨政府時的官員。此外，其國家安全事務團隊的另一特色在於他大量起用具右派色彩、鷹派作風、有軍事背景或俄國專家、及態度較親日的人士。

這樣的轉變自然有其中心思想。

三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定性

冷戰終結後，美國似乎沒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對手了。可是立國才二百餘年的美國，自從二戰結束坐上超強寶座後，便與蘇聯這強敵相競相伴，一旦對造傾頹、塌陷，心裏頭還真有股說不出的不習慣和不自在！仿佛國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似的！

⁸ 《美國總統普選結果 高爾贏了小布希將近 54 萬票》，“明日報”，2000.12.22。

⁹ In 1968 Clinton graduat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gree.

¹⁰ 傅爾布萊特是柯林頓老家阿肯色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 1945~74，也是反對越戰甚力的國際主義人士，深受美國各界及其他國家敬重。

¹¹ 過去歐洲人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乃依其主觀意識按距離遠近將東方各地分別稱為“近東”、“中東”和“遠東”。

¹² 例如：在爭取共和黨提名時，小布希曾表示：“我們必須信守在遠東地區的承諾”、其以總統候選人身份參加於 2000 年 10 月舉行的辯論中認為“美國戰略利益的四大優先考量應是中東、歐洲、遠東、及西半球。”

但美國總在潛意識中認為：任何一個在經濟、軍事上崛起的大國都將“自動”成為美國的敵人！儘管該國的主觀意願並非如此！

當然，這又與美國如何界定其國家利益有關。

但在 911 受襲事件之前，伊拉克的海珊、利比亞的格達費、南斯拉夫的米洛塞維奇、古巴的卡斯楚、北韓的金正日、馬來西亞的馬哈地等人，乃至號稱“殺死美國人才能上天堂”的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 及其所代表的國際恐怖主義、無所不在又難以防範的“網路駭客”、販毒、國際犯罪等跨國威脅，似乎都“匹配”不上美國這“偉大”的國家。

真正令美國擔心的是中國、俄羅斯、印度等所謂“轉型國家”。因為這三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蒸蒸日上、政治制度又沒有或者沒有完全“西化”、都有核武能力、經濟又在不斷發展。而中國則似乎被視為頭號的“潛在挑戰對手”。

在 90 年代中期，美、英等國沒由來的到處製造“中國威脅論”、將中國“妖魔化”，甚至將“黃禍”¹³ 一詞與這種論調掛鉤！顯示部份“白種盎格魯 撒克遜清教徒 WASP ” 始終存有“以西方世界為核心、而將非西方世界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對手”的獵巫心態！

事實上，中共的軍事、外交戰略基本上屬於“被動型”、“回應型”和“防禦型”¹⁴；儘管中共宣示主權及於台灣 含釣魚台列嶼 和南中國海及其上各島嶼之事仍屬重大爭端，但中共對上述區域之主權宣示不是已說了至少三、五十年了嗎？怎麼一夕之間就成了頭號威脅呢？這當中的轉變是什麼？是客觀因素？還是主觀因素？就算中共確有上述企圖，那也是“有限度的擴張”，它對取美國全球霸權而代之毫無興趣！在事實上也不可能！更何況上述爭端並非必然零和、也並非完全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那美國為什麼不朝這方面做努力呢？

國務卿鮑威爾(Colin L. Powell)在接受提名的演說中提到，新政府未來對中國的策略，是既不會把對方視為潛在的敵人或對手，也不會當作是戰略夥伴。但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謝爾頓(Henry H. Shelton)卻把話挑明了講，他稱中國為“21 世紀的蘇聯”。他的說法是根據 2001 年的國防部內部評估而來，報告中指出中國即將在 20 年內成為具有敵意的軍事與經濟強國。

¹³ 真要扯上“黃禍”，那就該針對曾以數萬鐵騎踏過半個歐洲的蒙古人的後裔“蒙古國，Mongolia”，而不是違反史實、選擇性的攀比附會、抹黑也曾遭蒙古大汗征服的中國！若說到對“東方”的恐懼，那也應把焦點擺在曾偷襲英、美、法、荷等西方國家的日本才對啊！

¹⁴ 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防禦戰略，以預防蘇聯入侵為目標；鄧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和“蘇東波”風潮之際，為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訂下二十四字的基本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他認為「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 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江澤民也提出其「居安思危、奮發圖強，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方針和「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對美方針。

這種手法究將使中共俯首認輸？或反而激起類似“20 年後的事，需要你官方現在這樣公開的大聲嚷嚷、還大張旗鼓的搞對抗嗎？但既然你都這麼認定了，我再不跟你一較高下，豈不辜負了你老美對我的抬愛？”之類的情緒？

然而，“民族主義”是種與美國的“愛國主義”相似卻又難被美國人理解的一種情緒和信念，挑起它，對美國未必有利！在朝鮮半島、在中南半島，美國的行動也只能落得和南北韓、越南、中國一樣兩敗俱傷，沒討到什麼便宜！

四 美國的配套作為

1 柯林頓時期

在 1993 年的銀河號事件¹⁵ 稍後，北京爭取 2000 年奧運會主辦權時，以一票之差，失去機會¹⁶。客觀評論，如果北京當時獲選，對於國際社會來說應更為有利，使大陸民眾認為奧運精神公正普照，讓激情期待的大陸人民不致於移恨西方國家，也對於促進中國大陸政經開放、避免民族主義昇溫有利¹⁷。

這兩次事件使許多原本擁抱西方價值與觀念的青年一代的熱情和自信受到挫傷，親美氣氛在大學校園退潮，從而產生了《中國可以說不》之類的書籍。而這種情緒很自然

¹⁵ 1993 年 7 月，中國大陸的定期航班「銀河號」貨輪從天津新港出發，經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達等地向科威特航行。美國的 The Washington Times 卻宣稱國防部近一個月來已透過“間諜衛星”等途徑，密切追蹤並掌握到「銀河號」載有可用於製造化學武器的“敏感化學物品”，打算運往伊朗。美國政府並提出由中方召回該船、允許美方人員登船檢查等無理要求。

消息傳出，幾乎所有西方媒體都競相大幅報導這項“重大發現”。在這種起哄、炒作下，“敏感的化學物品”變成“載滿化學武器”，最後又成了“核子武器”。

於此同時，美國第七艦隊還在公海上對「銀河號」採取長時間艦艇跟蹤並派軍機盤旋拍照等非常行動，干擾貨輪的正常航行。美國也向「銀河號」預計停留的港口所在國施壓，阻止「銀河號」按計畫進港卸貨。即便連江澤民都出面“鄭重”向國際社會聲明：“銀河號上沒有任何違禁物資”，但美方還是不相信中方的調查結果，仍堅持其所謂的“情報”正確無誤，使「銀河號」在公海上漂泊了很長一段時間，一度因缺油缺水而陷入困境。

9 月下旬，在中方同意及沙烏地阿拉伯代表的陪同下，美國中情局專家與海軍陸戰隊隊員在沙國的達曼港登船檢查，親眼看到船上確實沒有所謂的“化武原料”，打開倉儲後才發現是油漆，這起烏龍事件便尷尬的草草收場。事實證明，美國的指控毫無根據。這次行動不但失敗，也成了世界的笑柄 李潔明語。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合眾國際社相繼報導了這則消息；儘管它們都採取了明顯低調的處理手法。但誠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著名華裔學者、也是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的杜維明教授所觀察到的：諸多持續喧嚷了數月的美國媒體，在第二天竟然未做任何報導！

¹⁶ 2000 年奧運主辦權的投票共進行 4 回合，北京在前 3 輪所獲票數都領先雪梨；但在最後一回合以 42：44 敗陣。若其中再有一票投給北京，雙方平手，則應由國際奧會主席 Juan Antonio Samaranch 裁決；而西班牙籍的薩馬蘭奇已數度表明將支持北京。

¹⁷ 但美國的行動就像它在前一輪以大規模的公關經費為亞特蘭大市與雅典市爭奪 1996 年的奧運主辦權一樣 它才剛在洛杉磯辦過 1984 年的奧運，讓亟盼藉此紀念現代奧運 100 週年的希臘人憤恨扼腕不已。

的會有意無意地反映在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上。

1999年5月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曾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奈伊(Joseph S. Nye)在 1995 年還以“瓶塞理論 cap in the bottle theory”比喻《美日安保新指針》，認為可以用來制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但現為副國務卿的阿米塔吉(Richard Lee Armitage)與時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的奈伊曾於 2000 年 10 月 11 日發表的報告《美國與日本：朝向成熟的伙伴關係前進》則顯示美國新政府的亞太政策將急速傾斜，與日本結為同盟戰鬥體，甚至承諾將防衛在日本行政控制下的釣魚臺列嶼。

2 小布希時期

去年一、二月間，美國第一任駐中國大陸大使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¹⁸、第二任大使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及曾於卡特總統時期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的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奧森柏格(Michael Oksenberg)等人相繼過逝，似乎象徵著美國政府部門第一代中國通的凋零。¹⁹

而曾任第三任駐中大使的羅德(Winston Lord)、第五任大使的芮孝儉(J. Stapleton Roy)、曾任國務院中蒙科科長的凱德磊(Donald Keyser)²⁰、前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人的相繼離任、去職；在 1989-90 年曾為現任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zza Rice)在國安會時的上司、主張對中共採取 Engagement 交往政策的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則被外放為駐印度大使。

在小布希的外交團隊中，固不乏曾有接觸、處理東亞事務之經驗者，但似無真正理解中國及其想法的“中國通”，此點略可從其於撞機事件初期之交涉手法可知；唯一稱得上具第一手中國經驗的“政務官”只有駐中大使雷德(Clark Jr. Randt)。與前七任大使相較，他的優點包括：1、可直達天聽；2、通中文、亦曾派駐大陸，較瞭解中國事務；3、以商務背景為主，非軍事、情報取向。但他的弱點在於和政界、學界及輿論圈較無淵源、關係有限，在華府的國家安全團隊中缺乏盟友。

2001 年 4 月的美國間諜機與中共軍機擦撞、導致中方飛行員死亡、並未經允准即闖入中共領空且擅自降落在軍用機場，這次事件發展到後來已成“道歉與否”的意氣之爭！美方拒不道歉的思維邏輯中有很大大一部份竟然是“如果這次道歉了，那以後怎麼辦？”

¹⁸ 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前曾任“駐北京聯絡處主任”。

¹⁹ 美國戰後學術界的第一代中國通則包括費正清(Fairbank, John King)、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包大可(Barnett, A . Doak)、亞倫 懷丁(Allen Suss Whiting)、戴德華(George E. Taylor)等人。

²⁰ 現已轉任國務院亞太事務次卿，襄助 James Andrew Kelly。

將心比心，不過就是一句禮貌話嘛！美國太平洋艦隊之潛艇撞沉日本實習漁船愛媛號後便迅速道歉。但既已認中國為假想敵，若跟它道了歉，豈不沒面子？

第二節 國際、區域環境與短、中、長程時間之考量

中國的人口、民族組成、歷史背景、文化發展、地緣位置、意識形態、經濟條件、國家利益、國際角色均與前蘇聯有所不同；且各國對中國的認知、評價也未必與美國相似。

1990 年中共與里約集團建立政治對話關係、1994 年起參與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簡稱 ARF)、1996 年起的“上海合作組織”²¹、1996 年起的“ASEM 亞歐高峰會”、1997 年起參與東協 中日韓 10+3 與東協 中國 10+1 領導人會議、2000 年起中共與非洲諸國間的“中非合作論壇”、2001 年起的“東亞 拉美論壇外長會議”及擬議中的“東亞論壇”，在在都顯示各區域想擺脫美國的單方宰制，更廣泛、更平起平坐的與他國交往。

自 2001 年起於海南島隔年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及擬議中將於 2010 年成立的“中國 東協自由貿易區”等之經貿成效雖有未定；但在政治面，中國大陸顯然已從 1989 年鄧小平“決不當頭”的外交方針中謹慎的邁出承擔區域大國的領頭角色。

儘管仍迭有爭議；但，當諸多政、經專家都認為 20~50 年內，中國大陸將在不出重大意外的情況下成為具全球影響力的大國時，將其視為敵人對各國是否均為明智的選擇？儘管視中國大陸為假想敵不等於和中國大陸人民為敵；但若果真發生大規模且長時期的衝突，哪個國家能承擔起和十餘億人對立的代價？

第三節 敵友之辨與因應措施 對抗？合作？or 其他選項？

2000 年 10 月，一艘因補給而停泊在葉門亞丁港的美國軍艦遭到“自殺式爆炸攻擊”²²；而多年來，美國的駐外使領館總受到程度不一的侵襲，使得美國常基於保安理由，暫時關閉外館；甚至其國務院網站的首頁上必有一欄提醒美國人前往哪些國家可能遭遇不測！除了防範 除了圍堵，美國可曾認真思考過“為什麼？”、“為什麼常有反美示威？”、“為什麼有人對美國政府深惡痛絕到就算採取自殺式攻擊也在所不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富國有富國的作戰模式；窮人也有窮人的作戰方式！只要能有效打擊對手，又何需拘泥一格？²³美國是否從 911 受襲事件中發現“敵人竟無所不在！”而基地 Al Qaeda，阿拉伯文 組織所運用的打擊方式正是孫子兵法中的“因糧於敵”！美國究竟該治標或治本？

²¹ 係由“上海論壇”轉型而來，包括中國大陸、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六國領導人的定期會晤機制，目標在“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

²² 這起攻擊事件造成美軍 17 人死亡、39 人受傷。美國派遣了 200 名調查人員前往葉門；並“要求參與審訊”嫌疑犯，但遭葉門政府拒絕。

²³ 正因如此，“非對稱”戰法已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重視。

誠如曾擔任美國駐尼泊爾大使 第一位亞裔駐外大使、現為馬里蘭大學全球華人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張之香(Julia Chang Bloch)所說的“中國的年輕人對美國已失去信心，現在的美國可以是老師，也可以是敵人，但絕對不是他們的朋友”。²⁴ 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是否也說得通呢？

當美國在指責他國增加軍事預算時，自己不也在進行軍備擴張？而 NMD 毫無疑問的將破壞現存的 M A D mutual-assured destroy 相互保證摧毀、“恐怖平衡”架構！那麼，它所引發的風險是否大於所能解決的問題？是否反而導致軍備競賽？擴增海外基地是否反而激起、強化當地的反美情緒？又，中共應該不會笨到步蘇聯後塵去傾全力跟美國搞軍備競賽，而是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策。

是敵？是友？是否全憑一國之所好？箇中緣由是否全在對手？本國有無責任？是否全無迴旋、改善之空間？若當事各國能將用於對抗的人才、資源移作和解、交好、合作之用，難道不能互蒙其利？

第五章 結論

《列子》中有個故事說，某人遺失了一把斧頭，他懷疑是被鄰居的孩子偷了。便暗中觀察他的一舉一動，總覺得其言行、舉止、神態無一不像是偷斧之人。當他後來自己找到忘在某處的斧頭後，隔天再見那孩子，便不覺得他像賊了！像不像賊，都是自己想的。若心中有賊，則無人非賊、無處不賊。

筆者同意“假想敵”的概念確實有助於一國政府釐清其國防政策、設計外交佈局、進行資源配置。各國在制定政策時，不免需要一些參考座標，但若處置失當，亦可能因誤判而造成反效果。但其目標若完全排除或反客為主的忽略了“化敵為友”的上上之策，則很可能弄巧成拙。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判定假想敵時，若不能蒐集和研究對手的歷史、文化、人物、觀點與政策，豈不重蹈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在其越戰回憶錄《悲劇與教訓》中提及過往所犯的錯誤：美國的領袖們在越戰時自以為全知全能，靠著一群對中南半島事務外行的“專家”來做決策、制定相關政策，其結果便是 不但戰略設計有根本錯誤！甚至想不誤判意圖、情勢，都很難！

在判斷、認定“假想敵”之餘，各國也該相對地反思為何會被對手視為“假想敵”？應追根究底，化解衝突。毫無節制的擴張，將戰線延伸到無法兼顧的地步終究會讓自己樹敵過多！

殺人者，非兇器也，怨懟、憤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天下沒有攻不破的防線！但如今，許多國家似乎陷入了“唯武器論”、“科技萬能論”的極端！以美國為例，它在本土之外有駐軍、使領館、訪問團、跨國公司．．．，真的是防不勝防！該防的，是防人心，而非一堆金

²⁴ 《張之香：大陸青年不再信任美國》，中時電子報，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kosovo/88062303.htm>，1999.06.23。

銀銅鐵！

就外交方針而言，“非敵即友”絕對比“非友即敵”聰明多了！超強大國若能與其他大國做良性競爭與互動，或許更能贏得支持。對抗的路是很難持久的。別為了錯誤的理由、在錯誤的時代、跟錯誤的對象、以錯誤的方式、搞一場錯誤的對抗！應“以對話取代對抗、以交往代替圍堵、以合作代替衝突”。

基於現實的商業利益和處理國際事務 如：反恐 之需，美國終究是要在一陣試探、叫陣及適應期後與中共和北韓等國對話、和解、合作的。因此，小布希今年二月再訪中國大陸、與江澤民將回訪美國報聘的事便不令人意外。這不但是外交禮儀，也是務實的互相為用；至於其效益如何，便需從更大的視野來觀察。

至於台海兩岸，儘管彼此的政略目標難於短期內鬆動，但若能約束過激、挑釁的言行 如：與周恩來、喬冠華、錢其琛等相較，舉止粗魯不文如唐家璇者，應速予撤換；避免無謂的軍事恫嚇，互存最起碼的善意、尊重和默契，加強低度政治性領域方面之合作，應可緩和敵意、醞釀改善關係的氣氛。